

西陲坞堡与胡姓家族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二题

许全胜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依据《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刊布的文书，考证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坞堡，并探讨文书中反映的胡姓与胡名问题，以期进一步深化对中古西域文化的认识。

关键词：坞堡 胡名 粟特 吐鲁番出土文书 鲜卑 铁勒

中图分类号：K29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1）04—0079—07

一、《建元二十年籍》中所见高昌的坞堡

2006年10月，吐鲁番鄯善县洋海一号台地4号墓（即赵货墓）出土纸鞋所拆出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①，是现知中国最早的纸质户籍样本，对研究古代户籍制度具有重要价值。荣新江^②、张荣强^③等先生对此先后作了深入的探讨。此件文书有残缺，荣、张二氏都作有复原工作，但仍有未尽处（见下文）。除了户籍制度外，文书中所见十六国时期高昌地区的两种坞堡也值得关注。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下文简称《新获》，径出页码）177页第1行云“得孙翳坞下田二亩。”而179页17行云“埽坞下桑二亩入杨抚。”第一种坞以人名命名，也见于其他出土文献，如《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残卷斯〇一一三》有“居赵羽坞”^④，即其例。而第二种所谓“埽坞”则前所未见，何谓“埽坞”，荣新江先生解释说“埽坞”的“埽”指用埽做成的挡水之物，泛指堤岸。“埽坞”系指河岸旁之坞。此说显然是从《汉语大辞典》“埽”字条的解释引申出来的，而这种“埽”原指宋金时代治河，将秫秸、石

①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吐鲁番学研究丛书甲种之二，中华书局，2008年，第169、176~179页。

② 荣新江《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辑。荣新江《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的渊源》，《东洋文库论丛》第72号肥田和编《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の新研究》，第201~211页，2009年3月31日刊行。

③ 张荣强《〈前秦建元籍〉与汉唐间籍帐制度的变化》，《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④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3~7页。中外学者中最早援引此户籍残卷并注意到此种坞堡者是陈寅恪先生，见其《桃花源记旁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71页。原刊《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1936年1月。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十六国时代的户籍”中叙述研究史时未提及陈氏，见龚泽铎译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95页。

块、树枝捆扎成圆柱形用以堵口或护岸的东西。^①这样解释不但存在时代上的隔阂，而且把堵塞口岸的东西泛称“堤岸”也不能使人信服，由此再将“埽坞”说成河岸边的坞，从构词上来讲则更加不可靠。

其实“埽”字释读有误，原文从“土”旁从“巢”，不从“帚”，见于《广韵》、《玉篇》等字书。此字受下文“坞”字从“土”旁的类化影响也从“土”，实即“巢”字异体字。^②

案，“巢坞”与“巢车”构词及功用皆相似，可资比较。《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杜预注“巢车，车上为橦。”陆德明《释文》：“巢，《说文》作‘輶’，云‘兵车高如巢，以望敌也’。《字林》同。”^③《资治通鉴》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条：“（魏王）珪尽众攻之，连日不拔，使人登巢车。”胡三省注引杜佑曰“以八轮车上树高竿，竿上安轳轳，以绳挽板屋上竿首，以窥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别布车，可进退，圆城而行，于营中远视，如鸟之巢，亦谓之巢车。”^④

由上可知，古兵车有瞭望台者曰巢车，以轳轳升降以便观敌，人在台中，如鸟在巢。巢车《说文》作“輶”，而巢坞文书作“埽”，造字心理正同。不仅如此，巢坞与巢车一样，也应具备军事功能。坞堡中建有用于瞭望的楼橹等高台建筑的形象，在东汉甘肃雷台汉墓陶坞及河北安平、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等考古材料中都有十分生动的反映。^⑤

两汉时期高昌的壁与垒属于保卫屯田的军事设施，^⑥当时在边境地区还有坞（又称坞候、营坞），也是纯军事设施。而内地的坞堡，则与豪强地主的庄园经济密切相关。到魏晋南北朝时，遍布各地的坞堡，除了兼具军事作用外，其农耕经济的功能更显突出。从这件吐鲁番出土的前秦建元二十年户籍可知，在十六国时期高昌郡普遍存在着坞，其中如“孙翳坞”这样以人名命名的坞，应是当地的强宗大户，和敦煌郡的“赵羽坞”性质相同。另外，从户籍文书中“沙车城下田十亩入赵□”、“巢坞下桑二亩入杨抚”以及“巢坞园二亩入□□”^⑦的记载看，“巢坞”与“沙车城”地位相当，其下有桑田、园（应为瓜果园、葡萄园之类的园），存在农业经济。

据甘肃嘉峪关魏晋壁画墓及酒泉十六国墓壁画^⑧，可知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也存在着大

① 《宋史》卷九十一《河渠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2265～2266页。《金史》卷二十七《河渠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669页。

②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还有从“艹”头和从“木”旁的“巢”字，分别见S.2832《愿文等范本·因产亡事》“巢柯”（黄征《敦煌俗字谱》，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5页）及《高昌作人西富等名籍》“〔作〕人苟巢儿”（《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66页）。

③ 《春秋经传集解》第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56页。

④ 《资治通鉴》卷一〇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3445页。杜佑说又见《李卫公兵法》，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六年条，中华书局，1990年，第884页。

⑤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安平东汉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90年。《和林格尔汉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78年。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86～201页。

⑥ 王素先生曾指出“虽然史籍常常壁、垒混淆，界限不清，但高昌的诸壁、诸垒，从创始之初，就是有着明确的分工的。……壁是屯军壁，垒是斥候垒。……壁驻扎军队，垒担当警戒。”他还认为诸壁、诸垒后来有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参见王素《高昌诸壁诸垒的始终》，《西域文史》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⑦ 此见《新获》第179页第18行，现据文例补足。

⑧ 参见《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张宝玺编《嘉峪关酒泉魏晋十六国墓壁画》，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酒泉十六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

量坞堡。此《建元二十年籍》和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壁画墓的地域与年代最为接近，两者比较，更能互相印证。壁画所见的坞从形制上看有两种，一有望楼（见于丁家闸五号墓前室北壁画下栏），相当于文书中的“巢坞”；另一种无望楼，文书中的“孙翦坞”当属此类坞堡。壁画中还可见到坞堡周围有田地、桑树，并有家奴耕地、扬场和妇人采桑的场景，有的坞堡中还有果园，这与《建元二十年籍》中“巢坞下桑二亩”、“巢坞园二亩”的记载十分吻合，都反映了十六国时期西部地区农桑经济的基本状况。

“巢坞”在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也不鲜见，显然是沿袭了汉魏晋以来的传统建筑样式。“巢坞”之“巢”原文从“土”旁，应指用土石木所建，而不是纯木结构的建筑。除汉代坞堡某些楼橹有顶盖外，其他大多是无顶盖的。当时高昌郡各乡里，应和高宁乡安邑里一样，都有此类具备警戒功能的坞堡存在。而丁家闸五号墓壁画中，还可见干农活的多为高鼻胡人或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家奴，这也可与《建元二十年籍》中有关“虏奴”、“虏婢”、“西塞奴”的记载相印证。^①

总之，这件前秦户籍残卷的发现很有意义，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它使我们知道，那些具有楼橹的坞堡当时是有其专名的，即“巢坞”，这不仅在考古学定名上有其价值，还为我们深入研究当时的经济生活提供了鲜活的史料。《北史·王思政传》有云“修城郭，起楼橹，营田农，积刍秣，凡可以守御者皆具焉”^②，这句话可说是整个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广大地区坞堡式经济生活的高度概括。^③

二、新获吐鲁番文书中所见胡人

（一）西域胡人及其家族聚落

《新获》中公布了一批吐鲁番地区西域胡人家族墓地所出的墓志，文书中也可见到许多胡人的名字。这些文献中所见的胡人中，最引起学者们关注的自然是粟特人。

姜伯勤先生曾指出“现存吐鲁番文书中的昭武九姓人名，大致出现于6世纪。当然，粟特人进入吐鲁番地区事实上可能比现存文书材料所记早得多。”^④而据吐鲁番安乐城出土430年《金光明经》写本题记中“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之语，荣新江先生进一步推测早在5世纪上半叶粟特人聚落已经在高昌城东部建立起来。^⑤而联系到粟特文古信札所记4世纪初粟特人已到达敦煌，加之《十六国春秋·后赵录》中奉“胡天”的记载，荣先生更大胆地将高昌地区建胡天祠的时间推到4世纪中叶，^⑥这也就意味着粟特人在那时已在高昌建立聚落了。

① 见《新获》第177页第2行“虏奴益富，年卅，入李洪安。虏婢益心，年廿，入苏计。”又第179页第3行“西塞奴益富，年廿，入李雪。虏婢巧成，年廿，新上。”荣新江先生推测前两者来自北方外族，后者则来自西北塞外，到高昌国时期这种奴隶一般被称作“胡奴”。荣新江《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辑，第19~20页。

② 《北史》卷六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2206页。

③ 关于坞堡的专题研究，可参考（韩）具圣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堡》，民族出版社，2004年。

④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55页。

⑤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第44~45页。

⑥ 荣新江《吐鲁番出土〈金光明经〉写本题记与袄教初传高昌问题》，《西域文史》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新刊布的文书与墓志,提供了5至7世纪高昌粟特人历史的新材料。其中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1号墓(张祖墓)出土《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477年)张祖买奴券》,是最早的一件。^①券文由宋忠书写,记载“张祖从康阿丑买胡奴益富”,见证人为祖强迦奴、何养、苏高昌、康胡四人。^②从参加买卖奴隶交易人员的姓氏情况分析,双方是对等的。张祖为汉人,而康阿丑是粟特康国人,证人中祖、苏为汉人,何、康则是粟特人。吐鲁番出土同时期类似的文书,如柳方先生首先取以与《张祖买奴券》比较研究的《北凉承平八年(450年)翟绍远买婢券》^③中,却没有如此详细的见证人员情况。胡人家族墓地的存在证明了胡人聚落的存在,而分析其中墓葬风格及出土墓志等考古数据,我们还能对胡人聚落的内部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如对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地的发掘,^④可知6至7世纪交河地区粟特移民显现出逐渐汉化的趋势。^⑤

北朝隋唐时代,粟特胡人在聚落中一般实行内部通婚制。^⑥在吐鲁番市二堡乡巴达木墓地中的康氏家族墓M202《鞠氏高昌延昌十四年(574年)二月二十三日康虏奴及妻竺氏墓表》的发现,^⑦为此论点又增添了新的实例。康虏奴与其妻竺买婢,一为康国人,一则来自天竺。从其名字来看,其身份是相当低微的。M201还出土了木质墓表一块,铭曰“延昌十四年甲午岁二月廿一日,康虏奴公母墓表”^⑧比M202砖质墓表时间早两天。《新获》将其定名为“鞠氏高昌延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康虏奴母墓表”,盖以为“康虏奴公”母亲的墓表,然身份卑微的康虏奴似无称“公”之理,且高昌墓表中也未见称“公”之例。因此,我怀疑“康虏奴公母”应理解为“康虏奴夫妇”。^⑨从两墓形制及使用墓表等情况看,巴达木地区的康姓粟特人和交河地区类似,其汉化程度也相当高了。除了康氏家族墓外,巴达木墓地中还存在源自龟兹的白氏家族墓地,出土了土坯及砖质墓志多种,如《白愿佰墓志》、《白灰奴墓志》等。^⑩从“白灰奴”之名,

①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地区鄯善县洋海墓地斜坡土洞墓清理简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4页。又见《新获》第125页。

② 虽然柳方将“祖强迦奴”的“强”误录作“疆”,但还是看作一人。而荣新江及上揭简报皆将“祖强迦奴”析为“祖强”、“迦奴”二人。参见柳方《吐鲁番新出的一件奴隶买卖文书》,《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的粟特人》,《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据文书原件,“祖强迦奴”四字与下文墨迹粗细迥异,应视作一人为宜。“康胡”之“康”,诸家皆作“唐”。谛审原文,“康”字下部实为草书,非“口”字,文书其他“口”旁皆未有如此写法。

③ 柳方《吐鲁番新出的一件奴隶买卖文书》,《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翟绍远买婢券》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92~93页。

④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考古》2006年第12期。

⑤ 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的粟特人》,《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李肖《交河沟西康家墓地与交河粟特移民的汉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卷,2007年,第85~93页。

⑥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三《粟特聚落的婚姻形态》,第132~135页。

⑦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巴达木墓地发掘报告》,《考古》2006年第12期。又见《新获》下册第381页。

⑧ 发掘报告刊布木墓表摹本,“康虏奴公母”后无“之”字(见《考古》2006年第12期第65页图二三3),《新获》第380页录文有“之”字,细审图版,非是。

⑨ 据上引巴达木发掘报告,M202有木棺,其墓主人为1男2女,其中男性一人即康虏奴,而女性中一人当为竺买婢无疑。M201中则未见葬具与埋葬者,仅有木质墓表,其原因不详。荣新江在上引《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的粟特人》一文中将M201木质墓表归于康虏奴(这与《新获》归于康虏奴之母不同),而将M202砖质墓表归于竺买婢,也并不准确。

⑩ 参见《考古》2006年第12期《白灰奴墓志》又见《新获》第383页。

可见其社会地位不高，或许生前即从事与石灰生产或应用有关的工作。^①另外，《新获》和以往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有大量白姓人名，可见龟兹白氏家族居于高昌地区人数之众。^②

白氏、康氏等西域胡人家族墓葬区在高昌故城东北部巴达木地区的发现，无论从年代或地理两方面讲，都是对《金光明经》写本题记所示高昌城东有胡天祠的有力支持。^③

《新获》中所见印度人，除了上面提到的康虏奴妻竺买婢外，还有“竺客儿”（295页），“客儿”之名即说明他是外邦人。另外，有不少“竹”姓人，如竹尾端（5页）、竹本（29页）、竹苟奴（35页）、竹绪子（35页）、竹应（49页）、竹武仁（302页）、竹调梨（302页）。这里的“竹”氏显然不是姓氏书中所谓的古代孤竹国君之后，^④以前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人名中竹、竺两氏都有与胡语及印度佛教有关名字，如竹畔德（卫士，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537页。下文引用该书径出册数与页码）、竹阿闍利（三/220）、竹闍利（三/388）、竺佛图（二/412，二/416）、竺沙弥（画师，二/282）等。其中“畔德”疑即“盘陀”，意为奴隶；而“阿闍利”、“闍利”当即梵语、巴利语[acharya/acaria]的对音，义为轨范师。因此，竹氏其实就是竺氏，两者同源而异流。

（二）吐鲁番文书所见的其他少数民族

1. 鲜卑人 如果把九姓胡统称作“西胡”的话，鲜卑可称作“东胡”，以往学界较关注西边的粟特文化，关于九姓胡与突厥文化，蔡鸿生等先生已作过很好的探讨，^⑤但目前对九姓胡与鲜卑文化的深入研究尚有所不逮。高昌不仅有粟特人聚落、乡里的存在，^⑥也存在鲜卑人的聚落与乡里，同样应予以重视。吐鲁番文书中所见较重要的鲜卑族姓氏有和、蓐（薄）、目（穆）等，下面分别述之。

（1）和 吐鲁番文书中和氏人名颇多，《新获》所见有和寅海（12页）、和让（25页）、和怀洛（35页）、和武仕（302页）等。《魏书·官氏志》云“素和氏后改为和氏”，本鲜卑白部。《北齐书·和士开传》记“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亦可证和氏虽本鲜卑人，但与西域胡人关系密切。^⑦吐鲁番文书中有和氏取胡语名者，如“和婆居罗”、“和闍利”^⑧。

（2）蓐（薄） 《新获》著录有蓐富足（7页）、蓐钟（21页）、蓐德升（113页）、蓐子兴（130、141页）等人。此姓旧误释为“蓐”，姓氏中未见有蓐氏。此字实从艹从“蓐”，不从

① 石灰在古代高昌地区有较广泛的实际应用，参见韩香《吐鲁番出土衣物疏中“石灰”探析——兼谈其在古代高昌地区的运用》，《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5~122页。

② 有些甚至是同一人出现在不同文书中，如《新获》295页“白弟弟”，又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壹366页、贰99页。顺便说一下，《新获》295页《麹氏高昌张延怀等纳斛斗帐》题解据张延怀又见《吐鲁番出土文书》贰132页《唐张延怀等名籍》，推测文书年代在义和三年（616年）前后，这与上面两件有“白弟弟”之名的文书的年代正相吻合。

③ 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的粟特人》，《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

④ 傅永和编著《姓氏典故》，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2页。

⑤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

⑥ 荣新江《从聚落到乡里——敦煌等地胡人集团的社会变迁》，高田时雄编《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三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西陲发现中国中世纪写本研究班”，2009年3月31日发行，第25~36页。

⑦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2007年，第83~85页。

⑧ 分别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275页；肆，第8页。

“专”，即“蓐”字。^①“蓐”乃音译字，作为姓氏，当即本属乌丸的薄氏。《魏书·官氏志》云：“薄奚氏改为薄氏。”^②《前凉升平十一年（367年）王念买驼券》有“时人蓐显丰”^③，《说文》云“蓐，壁柱。从木，薄省声。”“蓐”或为汉人之薄姓。

（3）目（穆）鲜卑姓氏“丘穆陵”后改为“穆”氏（《魏书官氏志》云“丘穆陵氏后改为穆氏”），姚薇元先生指出“丘穆陵”《吊比干文碑》作“丘目陵”，而《南齐书》、《魏虏传》“目邻”、《王融传》“目凌”皆为“丘目陵”之省译，甚是。^④吐鲁番文书中既有穆氏，也有目氏。目氏即穆氏，两者是同源异流的关系，“目”当为“丘目陵”省改而来。

《新获》第311页有“白逢湍”之名，王丁先生认为“白”为“目”之误，甚是。^⑤吐鲁番文书还见“目浮知盆”^⑥，可知鲜卑族的目姓人来到吐鲁番后，还有起粟特式人名的，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鲜卑族的穆姓人名有“穆石石”、“穆苟苟”等叠字名，《敦煌差科簿》中有些被池田温先生认为是“归属难于断定的人名”，如“史苟苟”、“安奴奴”、“安主主”、“曹屯屯”、“曹/石稍稍”等九姓胡人，也取了类似的叠字名。^⑦这些九姓胡人有的取粟特式人名，有的取汉式人名，还有的取了突厥式人名，如“康特懃”、“安达汉”、“贺吐屯”、“何莫贺咄”等，^⑧或许也曾有过鲜卑氏人名，只是现在对鲜卑语所知甚少，还不能确定哪些人名是鲜卑语的读音。

2. 铁勒人 木纳尔 M102 显庆元年（656年）宋武欢墓出土《唐残牒》有“鸡弊埏奴”（121页）之名。案，此“鸡弊”[kiei - biei]氏，当即《魏书·高车传》之“解批[p'iei]”^⑨、《隋书·铁勒传》之“契弊”、《旧唐书·铁勒传》、《新唐书·回鹘传》之“契苾[k'iei - biēt]”。《高昌延昌九年（632年）调薪车残文书》见“鸡弊零苏利结个”^⑩。

（三）胡名及其还原

吐鲁番出土文书胡语人名一直为国际学者所关注，^⑪《新获》中也同样有一些胡名值得讨论。

1. 婆颡德 《唐某年八月西州高昌县宁泰等乡名籍》中有“（曹）婆颡德”（302页）一名，

① 即《楚辞·大招》：“脰苴蓐只”之“蓐”。

②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82~83页。

③ 《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2页。

④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29~31页。

⑤ Wang Ding, *Review of Newly Discovered Turfan Documents, Manuscript Cultures, Newsletter No. 1*, 2008. p. 26.

⑥ 《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25页。

⑦ 池田温《8世纪中叶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ーラシア文化研究》第1号，1965年。又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167~168页。

⑧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41页。

⑨ 又作“解枇[bī]”、“解比[bī]”、“解毗[bī]”，高车族人，后改为“解”氏。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156页。

⑩ 《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413页。姜伯勤先生指出“鸡弊零”即契弊、契苾、契必羽部，参见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109~110页。

⑪ D. Weber, *Zur Sogdischen Personnamengebung, 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 1972, pp. 191~208 [日]吉田丰：《ソグド語の人名を再構する》，《ぶっくれっと》No. 78，三省堂，第66~71页；Y. Yoshida, *Sogdian Miscellany III, Corolla Iranica*, pp. 237~241；Y. Yoshida, *Review of Sogdian and Other Iran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 II*, BSOAS, 57/2, 1994, pp. 391~392 [日]吉田丰《西安新出史君墓志的粟特文部分考释》，《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第26~42页。

前所未见,根据构拟的中古音并参考粟特语辞典,^①鄙见以为:

(1)“(曹)婆颀德 [bua - γiet - tək]”、“(康)婆颀骑知 [bua - γiet - gīe - fīe]”(一/359)、“婆个脍 [bua - ka - pīt]”(三/525)皆为粟特语 βγ' γšt [baγišt] (gods) 之同名异译。

(2)“(康)婆解 [bua - kai] (盆) prn”(三/536)、“(康)婆居 [bua - kīa/kīo]”(一/314)、“(康)婆何 [bua - γa] (畔陀) βntk”、“婆个 [bua - ka]”(一/244)则皆为粟特语 “βγ [baga]” (God, lord, king) 之同名异译,当指“大神”阿胡拉马兹达。

(3)“(康)婆居罗”(一/315)、“(和)婆居罗”(一/275)、“(田)婆居罗”(二/171)之“婆居罗” [bua - kīa/kīo - la] 则皆为粟特文 βγp' wr [baga - puθra] (god' son, prince) 之对音。^②

2. 浮啍 上引名籍中还有“令狐浮知延”,“浮啍”之名吐鲁番文书中多见,又作“浮知”,亦即天宝十载(751年)《敦煌差科簿》人名之“伏帝”、“勃帝”(如“何伏帝忿”、“石勃帝芬”、“康伏帝番”、“安伏帝延”、“曹伏帝延”、“罗伏帝延”。^③唐乾陵蕃王石像题名中亦见“何伏帝延”^④,皆为粟特文 pwty (Buddha) 之音译。^⑤

吐鲁番文书又见“曹不之揽”、“曹不之拟”、“曹不之拟”^⑥,颇疑“不之 [pīau - pīa]”与“浮知 [bīau - fīe]”、“伏帝 [bīuk - tiei]”、“勃帝 [buat - tiei]”一样,也是 pwty 之音译。

3. 浮多 上引同一名籍中“赵阿浮多”之名。“浮多 [bīau - ta]”疑即《敦煌差科簿》“康伏多”之“伏多 [bīuk - ta]”、“康伏吐忿”之“伏吐 [bīuk - t' a/t' u]”,又译作“浮图 [bīau - da/du]”(如吐鲁番文书中“康浮图”、“田浮图奴”)、“佛图 [bīwāt - da/du]”(如“严佛图”、“竺佛图”),均为“佛陀 [bīwāt - da]” (buddha) 之异译。

4. 盘提 此名见于“董阿盘提”(130、133页)。“盘提”疑即粟特语 βndy 或 bnty 之对音,^⑦意为奴仆。“董阿盘提”意即“董阿奴”。“盘提”在人名中又写作“畔提”,如“康畔提”^⑧。粟特语中,“奴仆”又作 βntk 或 βnt' k,^⑨一般音译作“槃陀”、“盤陀”、“畔陀(陀)”。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责任编辑:李文博

责任校对:陈霞

① B. Ghib, *Sogdian Dictionary*, Farhang Publications, Tehran, 1995.

② 荣新江先生在2009年8月27日给我的Email中转告毕波君的意见,她说“第一组,有以‘god’的复数形式作为名字构词成分的,但似乎未见以‘gods’来命名的。而且,所拟音与粟特语读音也有些对不上。第二组可以。第三组,我觉得不太像,可能更像是 Upper Indus, p. 45, βγryw ‘the rich god’。”

③ 石田干之助 (Mikinosuke ISHIDA):《天宝十载的差科簿に見ゆめ敦煌地方の西域系住民に就いて》,《东亚文化史丛考》,昭和53年(1979年)版,第819~826页。

④ 陈国灿《唐乾陵石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文物集刊》第2集,1980年,第189~203页。又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40页。

⑤ D. Weber, *Zur Sogdischen Personnamengebung, 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 pp. 199, 201; 又, Wang Ding, *Review of Newly Discovered Turfan Documents, Manuscript Cultures*, Newsletter No. 1, 2008. p. 26.

⑥ 分别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187页,叁,第26、28页。

⑦ B. Ghib, *Sogdian Dictionary*, 2648, 2668条, Farhang Publications, Tehran, 1995.

⑧ 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68页,此人为匠人。

⑨ B. Ghib, *Sogdian Dictionary*, 2656, 2660条。

onomous management system of society and culture.

Key words: Hinduism; Saka; Kushan; Kashmir; Shanpula; woolen carpet with figures

Khotan Buddhism seen in Tibetan documents Caiwojapu (75)

Forts on western border and the families of Hu:

two topics about The Recently Excavated Documents in Turfan Xu Quansheng (79)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cently Excavated Documents in Turfan ,this paper engaged in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forts referred to in the earliest Turfan documents and the questions of family and given names of Hu people to further knowledge of the cultur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mid – ancient.

Key words: Fort; Hu name; Sogdiana; Excavated documents from Turfan; Xianbei; Tiele

A school of the Studies on Han Slips

——Writing notes on Prof. fu’ s new book of slip studies Tong Ling (86)

Postscript on a fragment of Sanskrit drama from Afghanistan Chen Ming (90)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d Prof. Jens Uwe Hartmann’ s transcrip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 fragment of Sanskrit drama which was unearthed in Afghanistan in mid 1990s. Furthermore , some new thinking was proposed after referr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related to ancient Indian drama performance in Chinese version of Buddhist sutras for the studies of Sino – Indian drama relation history.

Key words: Indian drama; unearthed Sanskrit drama fragment; Sino – Indian drama relation

Tiermaqi: Kazakh’ s folk singing artist Huang Zhongxiang (101)

Abstract: Mainly referring to the poetry of Kazakh folk artists’ oral composition since 15th century , this paper conducted a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on Tierma: its changes , singing styles and contents.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Tierma pave the way for whom compos and sing Tiermas. Although Tierma could go back over centuries , it is not until 20th century that Tiermaqi , the composers and singers of Tierma , have achieved a respective scale and become a type of Kazakh folk artists.

Key words: Kazakh; singing artist; oral composition; Tiermaqi

Coexistence of “three factors” of cultural education

before Xinjiang Province established in Qing Dynasty He Rong (105)

The education of Kazakh during Republic of China Abudulijiang Sayeet (113)

The first study on theorization of Chinese vernacular characters composition

——according to Dunhuang and Turpan literature Zhao Hong (118)

An etymological study on Shu and Su millets in Uyghur language Shen Shuhua (122)

A brief summery to the domestic studies

on West Turk in decent three decades Ren Baolei (128)

Seminar On “Xinjiang History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y” Wang Xusong (136)

The Annual of Qing Dynasty: selection of Xinjiang Materials:

Compiling and Publication Zhao Xinghua (138)